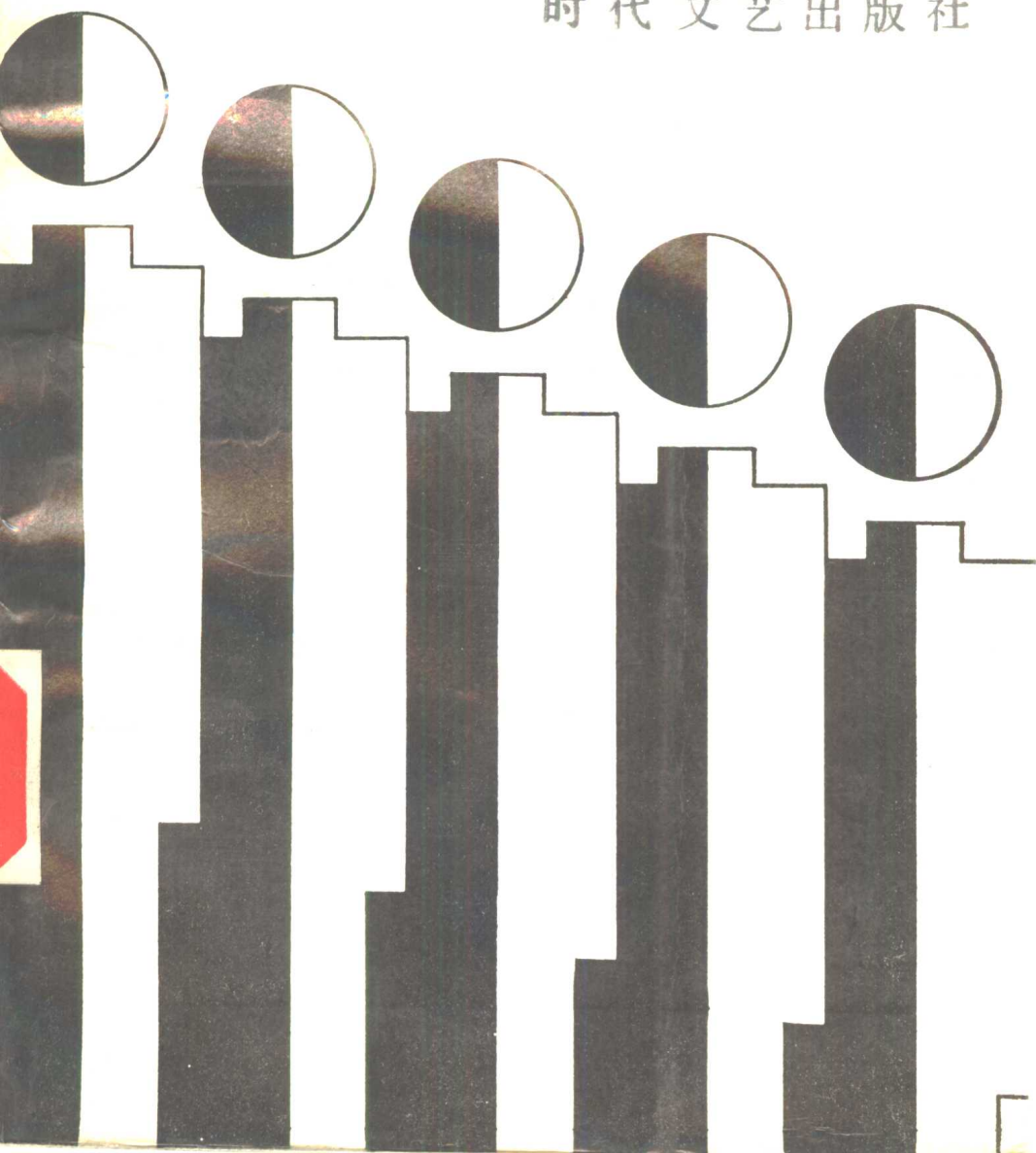


中国人史纲

上

柏扬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史纲 上

柏 扬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史纲 下

柏扬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史纲（上）ZHONGGUO RENSHI GANG 柏杨著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牟玉青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375印张 4插页35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30 定价：4.20元

中国人史纲（下）

ZHONGGUORENSHIGANG

柏 杨著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牟玉青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875印张 4插页 35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31 定价：4.25元

献给需要巨人呼唤巨人的时代

——《拿来参考丛书》总序

金 钟 鸣

不管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分歧，不管对新时期十年文学有着怎样的褒贬，有一点大概是作家、理论家都能够同意的：我们的文学，已经开始进入了广泛探索、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的时代。单单是对文学的估价不再是一个调子，一种声音，一类模式，而是有着差异，有着分歧，有着对立而又同样受到尊重的各种观点，就标志着封闭时期的结束，开放年代的开始。至少，我们的文学已经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坚定而又步履维艰地向着新的创造的时代过渡。在这个特定条件下，我们觉得迫切要把过去那些曾经粗心忽略、简单否定、盲目批判的世界名著和其它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拿来，郑重地向广大作家、理论家、文学青年和一切有志于文化的重建和超越的读者，提供多方位的参照系；也才有现实可能疏浚精神食粮的航路，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奉献给我们这个需要和呼唤文化巨人的时代。

作家、理论家在回首审视自己几十年文化创造足迹的时候，在面向未来雄心勃发而又力不从心的时候，都会痛感长期封闭所造成的种种遗憾、不幸和灾难。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标志，本质上是开放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放气氛中出现，因而也就成为人类的精神瑰宝。封闭政策，只能导致贫困愚昧，制造文化沙漠，产生由聋而哑、枯涸渺小的“末人”。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开放，就意味着面向世界。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歌德以其特有的诗人的敏感，预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如果说，歌德在这里是从普遍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出发，二十一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则把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那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怎样对待人类所

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知识财富，怎样培养新的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也有过精采的论述。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青年团的任务》这篇著名演说里，尖锐地指出：学习共产主义如果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即使读得滚瓜烂熟，那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列宁辛辣地嘲笑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种种胡说。列宁说：“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要是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引述这些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时候，在我们记忆的画面中，都会无法遏制地映现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贬损知识为重要特点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圣”之极、荒唐透顶的三千八百个日日夜夜。自封为马列“顶峰”、开创了人类文化“新纪元”的“文化大革命”，堂皇、野蛮、无耻、肆无忌惮地践踏蹂躏人类文明，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它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这可以看得见，可以用数字统计；它对我国人民在精神、文化、道德、心理等方面的扭曲、摧残，则无法估量，很可能要经过一个历史阶段，才会认识得比较清楚。

我们高兴地看到以反思、重建、超越为特点的“文化热”的出现。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上的“文化热”，缺乏应有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知识风貌和文化素质。如果不能迅速治疗长期形成的文化知识的营养

不良症，思维视野的狭窄单一症和理论、哲学的贫血症，我们将不可能对五千年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将不可能对十年浩劫作出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心理的科学的分析，将不可能写出饱满和着鲜明的当代意识的史诗性作品，那样，我们将愧对祖先，愧对后人，愧对世界。

时代文艺出版社地处一隅，编辑、出版面向高层次读者的丛书，困难和局限不言而喻。但是，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强烈地驱遣着我们，即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岗位上，也应竭尽绵薄之力，自觉地肩负起通向未来的闸门。

恩格斯曾经建议德国人“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编选那些“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有着“拿来主义”的明确主张和光辉实践的鲁迅，也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根据这些原则，从当前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拿来参考丛书》准备着重编选、出版三十多年来国内读者难以看到，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世界名著。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哲学、美学、艺术、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方面的论著；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以至当代的；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以至我国的。凡属难以看到的世界文化名著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都在“拿来”之列。

这套丛书准备收进一部分台港以及一些国家的华人作家、学者有参考价值的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同台港和国外华人世界几十年来缺乏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不管从哪方面讲，相互了解十分必要。同一种文化的几个分支，经过几十年的隔离之后重逢，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参照作用。

既然是“拿来参考”，收进丛书的就不会是大家都赞成的同一种观点。这里，会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以至封建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理论。对待它们，既不能盲目排斥，简单否定，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生吞活剥。我们相信广大读者都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都会具有锐利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坚强的肠胃，来认识辨别它们，分析批判它们，消化吸收它们。

在对待人类创造的知识和文明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气魄、广阔胸襟、惊人毅力、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十分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后来，当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的时候，马克思则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对黑格尔怀着真诚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研读、批判、吸收文化名著，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恩格斯不赞成费尔巴哈在突破黑格尔体系之后，干脆把它抛在一旁的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因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探讨、批判、检验人类所建树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才“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在我国现代史上，文化巨人鲁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解决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他有着深厚

的中国文化的根柢，又具有强烈的、多方位的开放意识。鲁迅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九十多个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出了三十三个单行本，加在一起有两百五十多万字，约占鲁迅全部文字的一半。鲁迅著作、书简、日记中，涉及的作家共有二十五个国家、民族的二百五十三个。鲁迅用极通俗、极形象的比喻，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说服、批评、告诫那些害怕引进西方文化的庸人：“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关于知识阶级》）出于对自己、对民族、对未来的充分自信，鲁迅对人类文明高度尊重，对外国文化不倦占有，挑选，吸收，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种牢牢立足中国、大胆面向世界、科学批判借鉴的拿来主义，是鲁迅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巨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这套丛书自筹备、编选、出版开始，便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领导、文学青年、新华书店和有关印刷厂的广泛支持和热情鼓励。利用这个机会，笔者代表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当代著名作家、文化部长王蒙同志来信表示了充分的支持。当代大作家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德高望重的钱钟书先生，同他的夫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先生，联名来信说：“这套丛书计划很有意思，只要切实实行，对读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预祝成功。”捧读国内外学人敬仰的两位老前辈的语重心长的亲切教诲，笔者心情至今无法平静下来。各个方面的支持、鼓励、期望，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具体地掂量了这套丛书的分量。同我们的学识、能力相比，我们实在是挑起了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但是，这项文化工程既然已经开始，就要切实建设下

去。我们一定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竭尽一切力量，努力不辜负广大作家、专家和读者的殷切期待。这套丛书肯定会有缺点、错误，更希望随时得到严格的教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厦门万石岩下旅次

出版说明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先生在台湾国民党监狱九年多的岁月里撰写的史学论著之一。作者以其独特的体例和分期方法，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写法灵活，叙述通俗，语言生动，熔历史、史论、文学于一炉，可读性较强。该书采用公元纪年，还按每一个世纪把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进行具体的横向比较，有助于拓展读者的思维视野和历史眼光。在各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中，这本书有一定特点，对于文学、史学工作者，干部，大、中学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著作“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样，一方面，它既“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对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和有创造有建树的重要人物，对农民起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不掩饰污点”，对封建统治者的反动黑暗面进行了揭露批判，对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反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史纲》的总的倾向是爱国的，进步的。另一方面，也给本书带来了某些局限性。它不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索和总结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另外，由于作者生活在台湾特定环境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我们不同，特别是在这部著作中存在某些与我国政府的政策不相符合的问题。例如，书中论述我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有时离开了民族平等的原则，而按照旧的大汉族主义的中国观念和所谓的正统观念去分析。这

样，就容易导致对兄弟民族使用歧视性的称谓和有伤民族感情的语言。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另外，书中所制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版图，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绘制的。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月

作者自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

（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午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的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的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的忧虑到出版的困难。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的慷慨承当，并为它定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的感动。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版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的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渤海，

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瑒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的混乱。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六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〇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〇〇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〇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的绕过年号，采用耶稣纪元，希望能简单迅

迹，而又正确无疑的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嘲笑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愤怒。其实在萨丁尼亚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固然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伊斯兰卡共和国建立，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象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谁也都更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象样的或不象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象悬着巨斧。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尽唇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连城，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于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局面，年号却成为正朔，王朝却成了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的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的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